

晚清政治思潮之動向

王 爾 敏

- 一、引 言
- 二、保守的動向
- 三、進取的動向
- 四、調和的動向
- 五、結 論

一、引 言

近代世局，中國亦正遭逢重大轉變之際。自傳統歷史經驗體察，則中國之所遭遇，頗如春秋戰國之萬邦林立。同時內部之嚴重性，亦恰如古代，即舊制度解體，傳統禮俗崩壞，一切社會秩序，頗為顛倒錯亂。道德規範，價值觀念，均已顯現新舊脫節現象。但是春秋戰國之文化思想，其發展出路，並無他途可循，而必須自破舊殘餘，醞釀生機。由中國民族自身創建新制度，安排新秩序。故在此醞釀期間，才智之士，頗苦悶焦灼，從事思考重建新制度之各種構想，思考安定天下之健全方略。而近代之中國，以西方勢力之衝擊。舊制度之破壞與消滅，更為迅速而嚴重，但其文化思想發展方向，立即可羣趨於西化，亦即西方文物制度，為最方便之取借效法之對象，無須為創立制度而徬徨思索。不過近代知識分子自有其更複雜之煩惱問題。並亦形成重大之困惑。其一，即中西新舊之觀念，不但不易相容，而且駁雜萬端。其二，西方制度習慣，在適應上有不少困難，至少亦有程度上之差別。其三，西方制度同樣是隨時變化，頗苦於追逐模仿。其四，西方制度未必是盡善盡美，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考驗，予人類帶來更多之徬徨與恐怖，人類全體，已瀕於毀滅邊緣。因此追隨西方路線，亦頗使人疑懼迷惘。然則實質上，近代之中國思想界，

其感染於西方觀念意識，已日見加深，其狂熱嚮慕，尙未見有減退之徵兆。

文化思想之嬗變轉承，起伏迂迴，藉時代潮流而推移奔放。然千里垂瀉，自有濫觴源頭；波濤汪洋，必有進趨方向。是以觀察思想之發展變化，或見衆流龐雜，端緒紛繁，而其終當須把握總體之動向，自可易見影響之結果，甚至尙可探測未來之趨勢。今以總體動向而論，實非一單純之直線路徑，且亦不限一種動力源泉，其進展過程，當是輾轉推移，蹀躞趑趄。推其大勢，則各時期自有一定之遞進階段，計其總程，亦足可觀。誠如近人賀昌羣所論：「一時文化思想之盛衰，隱隱乎如百川匯海，時或波濤澎湃，時或淵綜滄汪，皆有不得不然之勢。所謂『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者也。」^①此足爲思想潮流發展之自然動向之寫照。

探討晚清思潮之動向，大體而論，可以粗分爲三方面之發展。即保守、進取與調和三者。此三者動力，互相推移，而終於仍能循一定之總方向有所進展，此即三力匯合後而產生之總體動向，亦即構成近代思潮各階段發展之大勢。當然外在的時代時勢，更爲其有用之軌轍，與有效的動力源泉。事實上，保守與激進是文化發展必有的基本特性，實即文化發展本身之一體兩面。換言之，文化成就之本質，必不缺乏保守，亦不缺乏進取。兩者固然矛盾而不能並立，實則以先後之乘轉，隱顯互換，而產生相輔相成作用。人類天性有保守傾向，以使之作習慣性蓄存維持，並進而發揚其所蓄持之文化特質。或即表面削弱，而潛力存在，以待異日之顯現。人類復有進取喜新之傾向，以達成其吸收外來事物特色之願望，並用以充實固有文化特質。進而消彌其兩相衝突之性質，融會改造，而作更新之創制。至此種自覺性之消彌衝突，融會優長，亦並出於人類調和之基本性格，實相當於適應環境改造環境之原始本能。今論晚清思潮之動向，雖分別觀察其保守進取與調和之各個源流，實欲以見其總體效果，與最基層之潛流。然後提供國人以較實體之參考。

二、保守的動向

保守的動向，在表現思潮之流趨，並不純指保守思想，而保守主義當可以包羅

^① 賀昌羣：魏晉清談思想初論，第54頁。

此種動向之中。以史家討論近代思想之保守一面，全無衡量價值之意趣，且亦無所抑揚，至淺薄之非笑，尤非所取。^②

一人物一時代之思想，其形成本極複雜，尤其不免無數之變化轉折。即令執其一端而辨析之，其淵源、意旨、趣向、用心，均有不同程度之滲合，頗費尋繹解釋。今之言動向大勢，乃取其現象概略，繪其粗跡，用以表狀時代思潮之特徵而已。

就保守動向而論，即原存在於任何時代，惟近代最見顯著。而近代之保守，實亦具有若干不同思緒概念之內容，可以供人探索研析者。

近代保守傾向之表達，最直接最易見之處，是對外族之反應。因為近代思潮發展，帶使中國走向西化，其第一界限，即產生中西不同之差別，亦即相對分判本位與西化之對立。中國本位文化觀念之強烈，係宋、元儒家提倡之結果，諸儒之強調本位文化，頗受彼時外族壓力影響。自五代以迄明清，中國民族始終輾轉掙扎於淪亡境地。若不以本位文化觀念為固結維繫，則不免覆滅沉淪，永無翻身之日。換言之，千年來中國數度淪亡於異族，頗賴一批堅毅有恒之保守派學者，在無論如何惡劣逆境，循各種不同方式，得以固守其文化信仰，傳播後世。此項傳統性格，遂遺留當世一堅閉固拒之保守動向。其嚴重者，若徐桐屢為稗史譏嘲，固不必重述。然果有他例以見其大概者，又有內閣學士文治，其於光緒間爭鐵路疏有云：「聞鐵路而心驚，視電杆而淚下。」^③尤足見堅僻固陋之情狀。其次至如葉德輝、王先謙之反對康有為，亦均自本位與西化之對立而言。葉氏有謂：

「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改制之聖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啓超）人尚篤實，信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④

王先謙有謂：

② 當代學者研究代近思想，自潮流之反面入手討論者，成就至豐，若陳鑒、全漢升、呂實強、李恩涵、郝延平等多有專文專書論述，無待贅敘。此節則略申其未盡之若干觀點，或稍可補充前議，自以不重複舊說為準。

③ 知過軒談屑，卷二。

④ 葉德輝：邨園書札，第2頁。

「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爲一教，並非西教；其言平等，則西國並不平等，言民權，則西主實自持權。康梁謬託西教，以行其邪說，眞中國之巨蠱，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域。」^⑤

復次，保守傾向之另一表達，則爲維護儒家道統之理想。中國三千年來，歷經學者之提倡發揚，立儒學爲正宗道統，沿承既久，普及亦廣。自清末以前，凡識字知書，莫不以儒徒自居。近代中西接觸頻仍，西方學術漸次輸入，不惟宗旨別異，抑且信仰不同。遂亦影響及正統儒術之崇奉地位，衛道之士，自不免起而拒斥其所謂異端旁系之學，乃至形成保守態度。此中道學之士，著名者如理學大家倭仁之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正爲一時之重要代表。其所辯詰中西學術道藝之本末，正自居於儒家衛道之立場。如倭氏所謂：

「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⑥

復次，保守傾向之另一表達，則直就中國主觀立場而言。此與前論本位觀念，儒學宗統尙有小異之處，蓋由中外不同族之區別，以爲觀念基礎。其所持習慣之有力論調，或即聲號夷夏之防，以爲拒斥異類之壁壘。由是而並自蹈固陋，甘自抱殘守缺。王闓運之理論卽本此觀點：

「夫中外之防，自古所嚴，一道同風，然後能治。假令法國布堯舜之政，讀周孔之書，分置師儒，佐我仁政。則諸臣將束手坐觀，望風贊歎，以爲眞聖人之國乎。祇教之行，教堂之立，但當問其可行不可行，不當問其教善不善

^⑤ 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卷1，第36頁。

^⑥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頁。

。爲法國謀者，若使中土齋六藝之文，陳先聖之書，入其國都，宜我木鐸。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犬吠堯之義，明國無異政之禮。守死勿聽，以爲其主耳。」^⑦

復次，保守傾向之又一表達，乃出於政治觀念中恪守祖宗成法之信條，亦即不敢違背祖宗之舊規而有所更易。既不得更易，自遂進而爲墨守局面。原其基本理念，本自泛孝主義推廣而來，以孝治天下，自以步趨孝道而儀範萬民，用爲施治之準繩。其不肯祖宗，乃至大至顯之行爲，泛濫其義，遂並祖宗一切，不敢稍移。孝行本爲人倫之正道，然施之於繁雜政事，實難適應其變幻萬端，與詭譎世局。國人沿二千年來傳統，用以維繫社會風教，蓋屢見其效益。推之爲政治理想，當亦不失爲崇高原則。若事之爲施政準則，自不免迂濶自縛。其於外交軍事，尤難實施得當。且古之所謂大孝尊親。尊親乃宏揚先人業績，若一成不變，只在鵠守，又何足以符孝道。往史制度行爲之多見矛盾，若干因素，頗原於此。至清人不易祖宗成法，爲向來政論中保守派之有力武器，亦足知其有深厚之信仰基礎。曾廉之理論，即本此立場：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皇上爲祖宗持守宗廟，有萬世不變之法，有隨時修改之政，然其所以修改者，皇上度亦無以出列聖範圍也。故必常以祖宗爲心，兢兢罔墜。蓋爲孝子而後爲仁人，爲仁人而後天下蒙福，後世昭其令聞。伏讀今日詔旨，有曰五帝三王不相沿襲，有曰開創百度，有曰參預新政。臣不諳體例，顧有疑焉。以爲或是承旨諸臣，過事張皇，未能悉符聖意。不然，五帝三王，乃異姓受命，皇上上承祖宗，何以異姓爲比。且皇上既自以爲新，則必祖宗爲舊，皇上自以爲開創，則尤未知何以處祖宗也。」^⑧

復次，保守傾向之又一表達，在於固有權勢地位之維繫。此一論端，當代學者多有考究，而以陳鏊最爲強調。其以戊戌新政之遭受反對爲立論主題，探討出保守派所以構成反對勢力，主要衝突點，尙不盡在觀念政見之不同，實以固有權位與既

⑦ 王闓運：湘綺樓文集，卷2，第40頁。

⑧ 曾廉：瓢菴集。據戊戌變法，第二冊，第490~491頁。輯錄。

得利益有極密切關係。陳氏議謂：「變法之舉，首與最高權位之太后衝突，其次更不利於一般之守舊大臣。此輩為變法者所直接攻擊之目標。非傾覆變法之舉，無以自保。」^⑨

復次，保守傾向之又一表達，則為固有習慣癖好之沿承，無論有效與否，是好是壞，均不易改變。相反者則堅持維繫其存在價值。習慣癖好，安於固守，乃人類本性之一面，而在中國農業社會，歷代之施教，世風之薰習，均特別發展墨守固舊習尚，往往加深而成不可解釋之惰性，一旦置身不同格局，遂覺坐臥不寧。蓋人類共通之文化習性，於中國尤見強烈。近世風俗嬗變，制度衣冠，乃其顯而易見者，實則至細如語言文字，亦日新月異。依固有習慣衡之，乃視為佶屈聱牙，不堪入耳。王先謙攻訛當時新文體云：

「自時務館開，遂至文不成體。如腦筋、起點、壓、愛、熱、能、抵、阻諸力，及支那、黃種、四萬萬人等字，紛綸滿紙，塵起汚人，我公夙精古文之學，當不謂然。」^⑩

此外如葉德輝亦同樣感覺碍眼，而加以抨擊：

「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西，東施效顰，得毋為鄰女竊笑耶。」^⑪

近代文體之變，以光緒甲午為一顯著段落，亦一新時代文體之濫觴。後世學者或不覺察，亦少考究，治史者徒見其最顯著之政局變動，殊不知思想觀念，社會結構，文風習尚，亦產生轉變契機，並均在此一時期，展現曙光。當時保守者已有覺察，出而批評者尚不止王葉二人。

^⑨ 陳鑒：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燕京學報，第25期。陳氏舉證甚多，自不必在本文重複引括。

^⑩ 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卷1，第38頁。

^⑪ 葉德輝：郅園書札，第23頁。

以上大要六端，概略可見晚清人士保守傾向之本質，雖未能包羅完全，固是當時大致趨勢。然進而一論保守之意義，亦須作多角度層面之探討，而予以公平衡量。

保守之實義甚為明顯，即堅持固舊之態度。然此態度自以時代、地域、人物之相對比較而見其深淺強弱。統觀文化發展大勢，則任何一種民族亦決不缺乏其保守本質，實乃人類精神共通之本性。就此以論保守，殊無須多所贅辭。

進之以論中華民族，則就歷史相傳，保守實為中國文化發展之一項重要基礎。此就自然趨勢而言，尚不在歷代學者之強調提倡部分。無論就文物制度語言風習各方面，均足以察出遠古淵源遺意，以見中華民族善保守之特色。近代人士之保守傾向，自是繼承往古，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強化而已。

中國民族保守態度的傳統習性，與歷代異族入侵極有關係，南北朝、五代、遼、宋、金、元各代，有不少固執堅持之守舊派人物，用其殉道精神，在荒亂危亡之際，保存中國文化特色。首因其具有深厚之認識基礎，與文化教養之習性，由深刻之熱愛，而產生強烈信仰。遂至在任何惡劣環境之下，終能使中國文化有復蘇重光之日，此固保守人物之重大成就也。後人因其人格之感召，言論之薰染，遂亦沿承此種保守特色，久習而不能覺察，實近代保守動向所必不可免之本質也。

中國民族保守之手段，是採取文化之一致，以維護民族之延續。此實為中國民族文化發展之重大特色，而自秦漢統一前，已由孔子及其門徒完成健全之理論體系。此即孔子孟子所極力稱揚而提倡之三代禮俗相因，乃自堯舜歷聖相傳之道統觀念。蓋此理想發達，已泯除古代不同族類不同朝代之攻伐分割現象，遂以文化之一致，統攝民族之混同。中華民族之得以發展壯大，此種理想實為重要條件。然此保守動向之基因，當自有攸久歷史，與重大意義。近代之中國，不過承其流弊，為進步之障礙而已。^{①②}

①② 中國以文化之一致，維護民族之延續。此一觀點，因讀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書，感悟而得。往日讀其書為時已將二十年，舊時札記，尚全在手。茲錄其前書頁12~13所論：「復次，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曰為漢人，胡化之人即曰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其後書頁50所論：「總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關於胡漢之

中國古代儒法二家學者，提示「恥」字爲其強調實踐之德目，亦並爲傳統文化信仰有力之支柱。頗有助於民族文化色彩之自覺與強化，以及民族主義思想之形成。同時恥尙之理解與維繫，大致在藉保守主義而有所發揮。蓋政治體制，門第尊嚴；禮儀節度，男女冠裳，行動言笑，必各有其分，用以維持社會固有之秩序，而不凌躐督亂。嚴格恥尙，即在於肯定固舊之一切秩序價值，自然即形成爲保守動向之有力信條。

保守主義之另一有效之表達，即同時存在光復心理。保守之信念，寄於往昔光輝之想望，與深切思古之幽情。湯望舊日繁華之重見。或至在一民族中發展爲嚴正之信仰，若猶太民族之復國願望。楚亡國後光復故土之信心，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堅定意志，均足沿貫千載，誓守不失，用之以爲民族復興之思想動力。

近代中國保守傾向，固若前述跡象，或尙有更多細節，不易覺察。而保守者之運用與討論，尙有若干似是而非之信條，爲其便利工具。雖不足以形成廣大障礙，尙能多少發生消極作用。舉例說如孟子所謂：「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本在說明一種事實，而後人引伸，却變爲一種文化態度，又可推爲聖人之言。此在晚清言論中頗爲常見。又如漢儒經傳有謂：「工不十不易器，利不百不變法。」漢書又謂：「利不十者不易業。」這些只是安故守常之口號，本不足以構成堅強真理。晚清言論中，亦復常見。類此細節信念，亦多少產生若干保守力量。

中國保守傾向有一個共通的想象，爲其要求維繫傳統恢復固舊之認識基礎。那就是社會退化觀。其共同感覺所謂「今不如昔」，「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等等，則認爲現時社會正在日趨衰敗之中，於是以其使命感，出而力挽頹風，以拯救文化之淪喪。當然在歷史中屢見異民族之入侵，其毀滅性破壞摧殘，如迦太基

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爲分別，即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此意非此書所能詳盡，要爲論北朝史事不可不知者。」此後又在其所著：「元白詩箋證稿」，第293頁云：「吾國中古史，種族之分多繫於其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觀陳氏探討唐代文化，再三反覆言及此一重大關鍵，實用以解釋唐史之管鑰，由是並進而領悟中華民族文化之擴展，乃循文化道統之一體，爲其中維繫重心。

與印加帝國之沉淪，則足令人怵目心驚，以鑑省惕厲，團結禦侮。此在一民族發展振奮，固為必然。但世勢之嬗變，其必不至永久堅守固舊而不移。遞新之變化或足以充實原有文化質量，此類情勢，粗觀則只見其人事日非，即必視為江河日下；己身不求適應或不能適應，遂並視為世衰道微。實本觀察之錯誤，乃慨嘆今不如昔，衡量社會之變動，又誤以為轉向退化，則不免自陷蔽錮。此亦反映保守傾向之普遍心理，且正為保守者膏肓之病根。近代文人士紳，時見此類慨嘆，蓋此社會退化觀有以蔽之。晚清如葉德輝之論文如此：

「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有康雍之純樸，而後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畢阮諸人之實事求是，而後有魏龔諸人之嗜奇爭勝；有東塾之平實，而後有新學之猖狂，有桐城湘鄉文派之格律謹嚴，而後有今日時務報文之藩籬潰裂。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何論文字之粗迹乎。」^⑬

葉氏扼腕痛心其文體之溷濁鄙俚者，殊不知有一新文學生命正在孕育之中。此種把文化變遷現象視為退化，是歷來保守人物最普遍的錯覺。同時也正是一時代觀念衝突的重要關鍵。

最後有一問題，須作嚴肅考慮。即一九〇〇年庚子拳亂之後，何以國人多由強烈之排外，一轉而傾向於媚外，此時須就保守觀念作考察。蓋舊日之所謂保守固舊分子，多非由理性之認識確信唯能排外而始得保守自存，實多憑一種感覺意識，與感情之衝動，特別是由厭惡之反感，盲目排外。若郭嵩燾之所形容，見洋烟(鴉片)則爭相吸嗜，見火車、輪船、電線、機器則協力以攻毀之，以為愚昧不可理解。及庚子拳變，反洋失敗，狂熱之氣焰頓消，原無理性自信作支持，遂仍轉旋於感情心理範圍，一變而轉為懼外，由懼外自亦不免盡施媚外之術。此亦保守動向純由感情發展之結局也。

^⑬ 葉德輝：郎園書札，第2～3頁。

又：賀昌羣論及此種社會退化觀頗為中肯，見其所著「魏晉清談思想初論」，頁26云：「大抵衰季之世，世變湍急，前代之士風家法，既經毀敗，而新起之秩序，又不能樹立風聲，納之軌物。老師宿儒，復漸凋謝，後起之秀，未嘗薰習前代禮法，故易為新興風氣所鼓動，而馳騁於新潮之中。世之論者，遂認此為風衰義缺之徵矣。」

三、進取的動向

和保守相反的一個趨勢，就是進取。無論或激或緩，或遲或速，其動向則是發展於轉變的路途。求變求新，也就成爲進取的原動力。當然在最初啓念階段，求變求新的動機，是由某種程度的認識所獲得的結果。這也正反應出思想路向的選擇。所以求進取之思緒，自亦經過苦悶之躊躇與嚴肅之抉擇，且凡所舉步，又未必真能踏上坦途。是以近代中國之思潮，千變萬化，正可以表狀此種過渡性徬徨矛盾之特色。唐才常之自述，足以顯示進取思緒在焦灼中之醞釀：

「於是日與才常（譚嗣同與唐才常）謀所以變通之，激厲之。恒兩人對座，徹夜不寐。熱血盈腔，苦無藉手，泣數行下。不得已，欲就一邑爲新中國之萌芽。曾日月之幾何，遂忽忽五六年，終無成議。日暮途遠，人間何世，每一顧景，羣倫在疚。萬箭攢胸。我瞻四方，蹙蹙靡騁。」^⑭

由於一種苦悶的思慮，終於會醞釀出求變的意念，一發而不可遏抑，遂亦構成積極的進取動向。唐才常基於進化論之理解，而提出求新求變的嚴肅問題：

「余竊觀地球全局，變幻無常。往往異族而至本族不昌，新族逼而舊族日亡，更變迭代，萬事滄桑。日求其理，不可得解，則睜睜然悲，涔涔泣數行下。既而思之，霍然以寤，乃知本族舊族多狃于故習，憚于勤劬，始驕終靡，始妬終疲，既無一能一技，可以謀工商，參政事，則深山窮谷，漸爲若輩棲游之所。至異族新族之能覓地植種者，必有震動之力，智巧之思，爭自存而圖拔濯。故其聰明藝術，即當馳布種族之先聲。然則新舊種之迭爲盛衰倚伏

^⑭ 唐才常：覺顛冥齋內言，卷四，第30頁。

又：沅湘通藝錄，卷三，第41頁。唐才常亦流露同樣之啓機。「今者，天下之民之心，久病思起，久鬱思嚏，新機勃然。其洞觀世局者，且人人構一意、法、希臘之民之心於胸臆而不可遏。使當軸不乘其萌芽之機騁以康莊之路，而猶欲圈象之，檻繫不。竊恐局其身者不能局其智，忠其國者不必忠其君，而秦皇明祖之藩一潰而憂且劇也。即令民不智，防不決，而事變奇橫，土番膠聚，抵制無策，將伯誰呼，則是舉四百兆民，拱手而勝他人以奴隸也。」

，人爲之也，非天也。」^⑭

譚嗣同亦同樣表達其求新之意趣：

「歐美二洲，以好新而興；日本效之，至變其衣食嗜好。亞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國動輒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猶棲心於榛狫未化之世，若於今熟視無覩也者。莊曰：『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諡曰至愚，可不謂之大哀！」^⑮

求新求變之熱望，在晚清當有顯著疾速之增長。至所欲變之路線，則如普遍影響於政治的變法之呼聲。所欲新之事體，則如普遍爲士人討論之新學。實則其總體目標，俱以西化爲指歸。而西化實是當時進取動向的唯一出路，凡所變新，則無不以西方事物觀念爲效法標準。如湯震（壽潛）所提意見：

「今天下一機械之天下也，必墨守舊說，懸奇技淫巧爲厲禁，是廣田自荒，而張口仰食於西人，奚爲者。西人以機械治其國，事事標新領異，而舟車槍礮，尤爲利用之大宗。非西人之才力聰明駕吾華而上之也，特其得一新法，弋名甚捷，獲利甚厚。是以徧國中鏤肝鉅肺大小各有所成。往往早作夜思，殫畢世之精神，始成一藝。父作子述，合數傳之財力，始就一能。其所以傾家隕命而不顧者，以藝成能就，卽舉而白之於官，果爲獨出之奇，由官給予賞牌護照，俾獨售此技若干年，卽國家欲秘其技，不令另售，亦必給予巨資，以酬其勞，而償其費。故莫不推陳出新，不惜爐造化而炭陰陽，以鑿破其混沌之竅。中國宜亟師其意，以資董勸。」^⑯

^⑭ 湘學新報，第二十五冊。

又：湘學新報，第二十七冊，唐才常更明白表達其熱切求變之意志：「在昔皇王之典章文物，民種之聰強悍勁，國執之豫大豐亨，苟不泮以湯盤日新之學，策以姬宗無逸之志，則豈待火山爆裂，熱鎔冰遷，始睹所謂無窮之變哉。今夫以億兆年不相聞問之域，數萬里絕無膠葛之人，造物溝通，雷轟電掣，斯奇變矣。奇變而無以善之，而反逆之，是欲斷羲和之轡，絕昆侖之紐，遏星球之行，以構成奇殃也。今者遍美洲皆白種，其土種直鹿豕然，而天不哀之。洪辯子（唐才常筆名）且無暇哀美種，獨自哀我生以來，于天地人諸學毫無窺見，獨規規然繩墨中腐儒，視所謂紅皮土番者，不過多數行八比業耳。」

^⑮ 譚嗣同全集，第36頁。

^⑯ 湯震：危言，卷三，第28頁。

鄭觀應亦作類似解釋：

「今之自命正人者，動以不談洋務爲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噫，今日之緬甸越南，其高人亦豈少哉，其賢者蹈海而沉湘，不賢者覩顏而苟活耳。溝瀆之諒，於天時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務，如君父之有危疾也。爲忠臣孝子者，將反計求醫，而學醫乎，抑痛詆醫之不可持，不求不學，誓以身殉，而坐視其死亡乎。然則西學之當講不當講，亦可不煩言而解矣。」^⑮

講求西學，接受西化，不論晚清以至現今，實爲進取思潮之主要路徑。其表達其行動以至重大發展，則逐漸推及於方法，制度與習慣之全面改變。此種進取之形式，卽若吸取西方之工業技術，經營方式，政府制度，並爲顯見之實證。卽就社會組織而言，知識分子亦俱有根本改變。知識分子表現於進取行動，則組織學會，發行報刊，演說討論，在在無不取法西洋形式規制，實正爲社會結構西化之起始，亦並同時及於社會行爲之變革。蓋諸端顯著之習慣若吸烟、纏足、奢糜、繁縟等等，亦俱爲當時自覺性之改革目標。^⑯

凡爲進取，必有相當激衝之力，其發展自未必能十分允恰，不免流爲過激與極端。而熱情沸騰之言論，其所推動之衝力，尤其難能把握方向，在此情勢之下，所展現之激進觀念，自亦不一而足。若樊鍾之所謂：「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易籍之所謂：「一切制度，悉從泰西。」^⑰則俱爲激進之全盤西化論，亦並爲此一觀念之開宗先祖。若唐才常之「通種說」，易籍之「合種說」，直欲媾

⑮ 鄭觀應：《盛世危言正續編》，卷一，第13~14頁。

又：王韜：《易言跋》云：「當今之世，非行西法則無以強兵富國，故西人在今日所挾以輕藐我中國者，卽他日有聖王起，所藉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類此模仿西法之言論，晚清文獻中，數量頗多。本文列舉一二代表而已。

⑯ 參看拙著：「中國近代學會約論」。《食貨月刊》，1卷，6期。民國六十年九月刊。

⑰ 樊、易兩文，俱見「湘報類纂」，甲編，卷上。

通中外血緣，泯除種類區別，亦足見其思想激進之奇速。^②然此類思潮，基本認識，實建築在西方進化論的理解之上。正爲其西化意念之延伸。

進取之衝力，發展激烈，則隨時亦併生破壞力量，亦必至以排除障礙，而作各種破壞之行動。當然此種破壞，實出自於某種認識之信念，或在反方面設想，自有其極正當並且建設性之理論根據。但如此思潮鼓動，必達成他一方面之遭受破壞，乃是事實。若張之洞之建議改變學制，對於新式教育之倡行，有極大影響。其創說基本，表面似甚穩健溫和，然其發生之破壞力量，則足以於數十年內，傾覆佛教，而寄食書院之老儒，一朝頓絕其生路。張氏無意之建議，實帶來近世佛學淪滅之浩劫。然其正面理由，又十足款動人心。如其所論：

「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爲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爲。或曰：府縣書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爲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爲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爲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爲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朝廷旌獎僧道，不願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

^② 唐才常：覺顛冥齋內言，卷三，第51頁：「乾父也，坤母也，凡同受乾坤之氣者，既不得有中外夷夏之疑，又烏有並爲人類而無可通種之理。」易孺：「莫如以諸王郡主宗室縣主，下嫁於俄、德、法列邦之世子。王公、臺吉、貝勒、貝子、復廣娶列國之公主郡主。並下一令曰：上自官紳，下逮庶民，願嫁女於泰西各國者聽。願娶婦於泰西各國者聽。國家聯姻，尤貴擇西人之有智力者，既聯翁婿甥舅之親，即可從其中選用客卿，自當竭力爲我用，此所謂以愛力綿國運以化合延貴種也。」（湘報類纂，甲編，卷上，第6頁。）

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²³

激進之衝力，再度強化，發展高漲，自然就達於革命之要求，而至破壞暗殺，更成爲自覺性的行動。晚清若鄒容之「革命軍」，陳天華之「警世鐘」、「猛回頭」，吳樾之「暗殺時代」，則俱表現激烈的革命意旨，實爲最急進之進取動向。²³

激進的動向不單是向內發展，驅除內部障礙，同時更向外發展，以掙脫帝國主義之枷鎖。而排外觀念，則構成另一方向急進之思潮。麥孟華提出其心力排外之理論，爲文明排外之先聲：

「中國人烏知排外者哉。排外之道有二，野蠻人之排外也，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也，排以心力。排以腕力者，憤外人之侮我，視之如讐，防之如賊。外人之來我國也，必將深閉固拒。則外人之文化智識必不能資其益而取其長，而一人腕力又非百十腕力之敵也。其力將必有所絀。力之既絀，則外人之來而侮我，將又百十於昔日，而更無術以拒之，且冒犯不韙，背公理而觸萬國之怒也。外人則賤爲野蠻，憤爲公敵，合諸國之力以爲報復，且藉公義以縱其私謀，悍然無復顧忌。極其踐踏縛壓，皆視爲待野蠻之公法所當然，

²³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第8～9頁。

又：沅湘通藝錄，卷3，第19頁，何紹休云：「曰：減寺宇以厚積藏也。夫天下寺宇，不下百萬萬所。於國家無所裨，宜省之，持其費納入會中，以補此項之闕，以培利用之源。」

又：就王闈運之兩通函件，可以了解在前後世代嬗變之間，某些人必然流於沒落情狀。其致湖南巡撫趙爾巽云：「竊以爲國家學政，本有專官，上失其職，咎不在下。今之改學，卽務在糜費，官款無出，專恃民貨。以有事之秋，興不急之務，並心外國，專聘倭師。就一學論之，堂舍器具，費至萬金，教習監督，薪水數千，購置書器，錢亦千萬，一縣物力，必不能供。常德奪產殺僧，郴州遂至民變，湘潭蓋歸侵蝕，寧鄉徒事誦張，以此開宗，何能造士？且漢儒稱盛，良史譏爲利祿之塗，宋學廣開，先儒尤憾科舉之士，儒爲國蠹，有由然也。今須先明廉恥，分別士民，次整儒官，以修專職。謹擬學規，聊備瞽說，人存政舉，則在明公。」又致湖南鐵局總辦云：「作過清泉學舍，垣牆盡圯，水亭傾倒，昔年觸詠地，遂成泥坑。亦不待裁教官，改學司，費青年英雄立憲也。端撫一來，湖南全省，化爲異族。昔與郭筠仙（郭嵩燾）論王文韶不能亡湘，今端方竟能變湘，弟之無能如此，亦何顏更設臯比，再列小脚？唯有拜受康子之藥，飽啖陽虎之豚，以卒餘年而已。」（兩函俱見湘綺樓書牘）。

²³ 鄒容、陳天華、吳樾諸人著作，俱見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一書。

而排外者力窮理屈，排無可排，遂不能不低首吞聲，以受其壓制。以心力排外者，其待外人也禮貌有加，其善外交也儀節不失，雖世仇夙怨之國，受其偏辱，舉國所欲得而甘心者，其往來酬應，殷勤無以異於姻婭。且惟積怨懷仇之故，則彌師其政學，輸其文明，外奉其敵以爲師，內善其國之政治。至於自主之內政，國家之主權，下及國民享有之權利，則雖至小至弱之國，必不容他人有一毫之干涉，有一事之侵犯。而外人之耽逐窺伺其傍者，亦憚其心力，爲所抵抗，不敢施其干涉侵犯之謀。此二者排外之心雖同，而排外之術迥異，此國之盛衰興亡之所以殊其效也。」^{②4}

急進的革命分子，如吳樾之高唱暗殺主義者，亦同樣力主排外：

「我同胞之稍具知識者，見外人之據我土地，奪我利權，奴我子女，莫不曰排外，排外。夫然，不排外則不得復我土地，不排外則不得還我利權，不排外則不得歸我子女，國不可無，則排外不可不有。排外之係於國，不如此其重且大乎。予亦同胞中之分子耳，又焉能外我同胞之所見也。」^{②5}

陳天華更是激烈的呼號，熱血沸騰，怒聲若雷電：

^{②4} 清議報，第68冊。

又：同書，麥孟華更提出其清晰之理論基礎云：「天下之國未有不排外而能獨立者也。排外烏乎起，起於界限，而爲原人天賦之公同性質者也。界己之身，而名人曰外人，界己之家，而名人曰外家，界己之國，而名人曰外國，界己之種，而名人曰外種。既劃此身、家、國、種之界，則用情行辜，自不能無厚薄於其間。故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同室有鬥則纓冠，鄉鄰有鬪則閉戶，雖聖人亦昌言而不能諱也。故夫野蠻之世，則排外之心最熱，而排外之列最嚴。家族部落之時代，無不仇待外人，外人非得內人之保證，則不能居其境內，而禮貌與刑律輕重，必極其不平。羅馬開化最早，固嘗定公共之律以保護外人，而外人之受其保護者，猶不及羅馬之半。今世歐洲日以文明號於天下，其民法刑法同一定律，而不以內外人之界限爲輕重矣。而關於國法者則例仍極峻，其公民之權惟內國臣民所應享，而外人必不能與其分毫。且其民之移居他國，及出嫁於外人者，則必除其國民之籍，奪其公民之權，屏之於外人之列。嗚呼，排外者天賦之公性，人道之必不能已，既有國界，則雖耶穌爲君，墨翟爲相，亦豈能泯其界而引而內之哉。」

^{②5} 吳樾遺書（即暗殺時代），辛亥革命，第二冊，第381頁。

「於今的人，都說中國此時貧弱極了，槍砲也少得很，怎麼能和外國開戰呢？這話我也曉得，但是各國不來瓜分我中國，斷不能無故自己挑釁，學那義和團的舉動。於今各國不由我分說，硬要瓜分我了，橫也是瓜分，豎也是瓜分，與其不知不覺被他瓜分了，不如殺他幾個，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兒。俗語說的趕狗逼到牆，總要回頭來咬他幾口，難道四萬萬人，連狗都不如嗎？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有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衆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仇人方罷手！』我所最親愛的同胞，我所最親愛的同胞，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殺！殺！殺我累世的國仇，殺我新來的大敵，殺我媚外的漢奸。殺！殺！殺！」²⁶

當然在此時期之急進分子，其所欲驅除之進取障礙，內則專制王朝之壓迫，外則帝國主義之侵逼，都是最顯著的第一等目標。促使此等國民之採取如此非常手段者，無論就時勢，就理想，就一民族之生存奮鬥，此類急進俠士，均足以代表中華民族最高貴之光輝，其所爲義行，尤足以爲後世所崇奉讚頌。中國人民之早得脫於水深火熱，實賴本民族中尚有不少激進之俠士。

²⁶ 陳天華：警世鐘，辛亥革命，第二冊，第121頁。

又：陳天華：警世鐘又云：「有人口口說打洋人，却不講洋人怎麼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一經事到臨危，空拳也要打他幾下，平時却不可預存這個心。即如他的槍能打三、四里，一分時能發十餘響，鳥槍只能打十餘丈，數分時只能發一響，不學他的槍砲，能打得他倒嗎？其餘洋人的長處，數不勝數。他們最大的長處大約是人人有學問，（把沒有學問的不當人）有公德，（待同種却有公德，待外種却全無公德。）知愛國，（愛自己的國，決不愛他人的國。）一切陸軍、海軍，（各國的將官，都在學堂讀書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藝無一不精，軍人亦很有學問。）政治、工藝，無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這些事體，中國那一項不應該學呢？」可知陳氏雖激烈排外，却並不反對西化。

至於在思想上之發展，過激而又過激，竟至不幸發展為虛無主義之信仰，於是理論上認為凡固有之事物，俱為進步之障礙，亦俱在破壞掃蕩之列。同時並相信憑空可建立新天地新世界新文化之虛空理論。自晚清新民叢報、民報相繼鼓吹虛無主義以來，此種排除固舊之意念，開闢新天地之遐想，遂注入中華民族激進派之血脈。雖不是人人信為真理，實確為時時備受利用。七十年來，若排山倒海之勢，凡為固舊，玉石俱粉，破壞打倒，迤邐相繼，數千載文化遺產，遂遭空前浩劫。此種有自覺性之破壞動向，正不知何日或已。蓋進取之不已，終以原始人類為最後目標，人復喪失其語言、智慧、行為、能力，以為茹毛飲血之世界。但他方族類，不作此想，保留文化，發展文化，正以宰割奴役此種退化之民族。

激進之衝力，足以驅障，若薑桂起疾，達其猛濟之效，近代劇變之中國，自不可缺少，亦不能避免。然其破壞打倒之餘勢，亦產生意料不到之副作用。其一不能料知之效果，即破壞時已良窳不分，而壞惡處又頗多保留殘餘。他者無論，舉一端可知，即特權思想，於此民權發達時代，亦同時存在人人骨髓之中，隱然支配政治、經濟、社會之發展。其二不能料知之效果，即打倒權威却再建新權威，推翻正統却再建新正統，破除迷信却再建新迷信。六十年來思想界，極顯現此種矛盾之色，正待冷靜之學者思考追索。其三不能料知之效果，即醫方亂投，真病難除。激進者之取決神速，不惜大刀濶斧，殺伐從事。而建策之方，進取西方不同國度，駁雜零亂，矛盾瑣碎，樣樣嘗試，不免徧罹刀割。（此如民初梁啟超之就醫，初斷患在牙齒，遂拔牙七隻，病未除而七齒已不復存；繼斷患在腎臟，遂割一腎，病仍未除。）大抵激進者救國理論，多相信舊者除盡，新者必來。實是自誤誤人之天真想像。蓋當世非、澳、美等洲，原始民族不一而足。原即受西方列強統治，絕不乏接觸文明機會。本無文化可言，自不待有除舊之煩，又何嘗有驀地創出新文化或移植他方文化之奇蹟。在理論上說，當知舊者除盡，新者未必能來，實為理性之了解。且沿歷萬代，中西古舊文化，全為後人役使，進之可啟發創新思想。惟在乎智者能者之活用。至雖鞭撻古人屍骸遺物，置之粉糜，徒耗日力精神而已，何補於當世之文化。

進取思潮，表現不斷之變動，有各種情況具備過渡時代之特徵。其一即人物新

舊之轉化。晚清人物接觸變幻之世局，有所感悟警覺，多是由守舊觀念，轉變為趨新觀念。由是一人物前後思想，有守舊與維新之不同。晚清最著名守舊領袖醇親王奕譞，在同治八年表達其極端閉關思想，直建議驅盡洋人，停止邦交。其中關於西方新事物亦表示澈底摒除，如其所謂：

「玩物喪志，自古皆然。從前烏夷入貢，原係震懾皇威，輸忱獻曝之意。今則抑勒中國，勉強通商。凡有血氣之倫，無不思將洋貨投畀水火。且其貨物，惟自鳴鐘、洋表、洋槍均可有用，然亦現在中國能造之物。其餘盡可一概不用，無損於國計民生，有裨於人心世道。不才如臣，從未以洋貨為尚，況抱負不凡者乎。」²⁷

然在光緒六七年以後，醇親王則一變為推行新政之首腦，凡關鐵路之興築，兵船之購置，海軍衙門之創設，臺灣之建省，均以其有力支持，而獲得實現。其他經轉變之次要人物，當復不少。

其二則同一進取人物，因其不斷轉變，遂至自我攻伐，以後日之所謂是，再事粉碎前日之所謂是。即同一進取或激進，而在同一人物思想之嬗變，亦表現諸多矛盾衝突。如由激進而發展為過激者，若梁啟超之自我檢討，最足代表。其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論」，附述有謂：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予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²⁸

²⁷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64，第5～6頁。

²⁸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9，第50頁。

又：清議報，第一百冊，梁啟超亦有相類之表達。如云：「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分。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作者當時承乏斯役，雖然今日檢閱其舊論，輒欲作嘔，覆勳其體例，未當不汗流浹背也。夫以作者今日之學識、思想、經歷，其固陋淺薄，不足以當東西通人之一指趾甚明也。則數年前之庸濫愚謬，更何待論，而舉國士夫乃嘖嘖然目之曰此新說也，此名著也，嗚呼！傷哉，吾中國人之文明程度何低下之至於此極也。」

如由過激而轉變為穩慎者，若章太炎之自我檢討，最足代表，其致柳詒徵書有謂：

「頃於史地學報中得見大著，所駁鄙人舊說，如云孔子竊取老子藏書，恐被發覆者。乃十數年前狂妄逆詐之論。以有弟兄唬之語，作逢蒙殺羿之談。妄疑聖哲，乃至於斯。是說向載民報，今叢書中已經刊削。不意淺者猶陳其芻狗，足下痛與箴砭，是吾心也。感謝感謝。胡適所說周禮為偽作，本於漢世今文諸師；尚書非信史，取於日本人；六籍皆儒家託古，則直竊康長素之唾餘。此種議論，但可譁世，本無實徵。且古人往矣，其真其偽，不過據於載籍，而載籍之真偽，則由正證反證勘驗得之。墨家亦述堯舜，並引詩書，而謂是儒家託古，此但可以欺不讀書之人耳。長素之為是說，本以成立孔教。胡適之為是說，則在抹殺歷史。推其所至，十七史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一切稱為偽託，亦奚不可。而儒家孔子，究竟有無其人，今亦何從質驗。轉益充類。雖謂我生以前無一事可信，無一人是真，可也。此其流弊，恐更甚於長素矣。足下辭而闕之，正如鳳鳴高岡，鳩鵲不能以啁噍相對。此一快也。」²⁹

其三則為全面性之連鎖批判，正足代表過渡時代之特色，且有廣泛之發展。連鎖批判，表現於當時代人對於稍前一時期之思想論說行動之批評攻擊，甚至諷嘲戲侮。當然稍前一時期人物，應同是革新領袖分子，惟以彼等之學說理論，在稍後者視之，覺其幼稚淺薄，誇誕錯誤，遂即予以駁斥非難。雖出之於個別表達，而實際則顯示進取程度之不同，整體性不同觀念之分野。就時代觀念而論，一項新學說風靡一時，而不久為人識出破綻與弱點，加以批判，更創新說。新說之後又生有更新之新說，以推翻前一新說。如此連鎖發展，批判不止。此既表現不斷進取之動向，且亦構成過渡時代之特色。晚清前一時期，新派人物與守舊勢力爭辯，費盡筆墨，焦思苦索，以維新變法，當其救國救民之初志。然以時局進展，乘時會而廣得信從者之擁戴。然進取之勢，不久即飛越於另一階段。在清末最後十數年間，維新派的

²⁹ 學衡，第73期。

學說理論，變為不合時宜，被人渲染為腐臭過時，且遭到多方面之批判譏諷。前期維新派批判守舊黨，今者有更激進之言論以批判維新黨。這裏必須澄清一項觀點，即此等論爭，並非是政黨政論派別之分野，如清末立憲政論與革命政論之不同理想者。而實在是思想上縱方面的發展。以梁啟超之批評維新派，為最清楚的代表：

「新黨也，新黨也，吾為之舉其大略，白其心跡，約含數派而表之。民賊派：取泰西之新法可以壓制防範吾民者。利祿派：借新政新學以博取功名富貴者。名譽派：但博維新之美名，不必求實際者。製造派：專言製造者，中國言算學者尤衆，可以製造括之。科舉派：科舉既變，不得不轉移者。風氣派：隨風氣轉移者。無恥派：專以媚外為主義者。」^⑩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舊式維新黨人尤其沒落，遂更成為洋場學士嘲弄戲侮的對象，一時「老新黨」之名詞，紛騰於士林之口。甚焉者，攻弱搗昧，專以詆譏過時人物鳴高，以示進步。民國初年，此類文字流行既多且廣，一時少年，頗為風靡。^⑪然而，稍後更深入新進之學者，又把這些浮薄誇詐的言論，一概斥為假洋貨的虛聲盜名。^⑫如此連鎖批判，一直向前推演，變化不止。

總觀其進取思潮，雖不免花樣繁多；而發展趨勢，終不外唯其求新之一途。一般文化心理反應，認為凡新者無不善，無不美，無不高妙，無不有用，亦並無不悅

^⑩ 清議報，第97冊。

又：梁啟超又於清議報第一百冊云：「觀其論說，非西學原出中國考，則中國宜亟圖富強論也。展轉抄襲，讀之惟恐恐，以故報館之興數十年，而於全國社會無纖毫之影響。」此亦表達對維新派言論之譏諷。蓋時代在前進，維新派言論，多已失去影響力量。

^⑪ 上海研究資料續集，第101頁，吳稚暉記述其思想變化之五步，其第三步中見康有為經過，頗為繪形繪聲的譏嘲舊派維新人物：「丁酉（光緒二十三年）冬天，我在北洋學堂教書，放了年假，到北平去看廉南湖。其時火車尚停在永定門外馬家坡。於十二月十七那一天，南湖約了紹興陶杏南，同我三人，到米市胡同去看康有為。大家論到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八股、小腳、鴉片三害。我說，八股，我們可以自動不赴考；小腳，可以不纏；鴉片，可以相戒不染。康就用兩隻手伸了兩個大拇指，狂喊：「好極了呀，好極了呀。」那種氣概，現在是三四等政客都優為之，當時我們却從未見過，不覺驚異是天人。」

^⑫ 宗白華、魏嗣鑾抨擊一時自命提倡新思潮之學者，極為嚴正深刻。參看郭正昭撰「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所引宗、魏二人原語。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納。實自清光緒中葉以來唯新思想之無限推展與翻新。新新不已，直迄當代。以新名詞之冠以「新」字者論，現代文獻中，不難以萬千計，蓋可確知進取動向基本動力源泉之所在。

四、調和的動向

調和之思想動向，並非是介於保守與進取之間，尤其不是兩可之主張，而會認為保守也好，激進也好。調和之思想，實自有其一定之認識與信仰基礎，並且對於文化態度，救國方策，提出若干特立的理論，綜其若干不同重點不同立場之論調，實足以見出一種調和之思想動向，可以並立於保守與進取思潮之外，獨立滙為潮流者。^③

若以人物為主體，以論思想流派，此種調和思想，自然被視為新派人物所有。然因時代轉變迅疾，一人物之思想，前後多有不同，甚且矛盾衝突。而即所謂新派云者，又必被再分為溫和派若立憲之類，激進派若革命之類。甚且革命派又可再分為極端分子與中和分子等等。實則思想之分歧，應以思想觀念為主體，乃比較少有雜亂而難統一之病。故是討論保守、進取、調和思想之動向，單以觀念之性質分別，於釐清近代思想潮流，實較為簡易醒目，尤其可省却類多人物前後思想矛盾之位置安排問題。

調和思想在表達各種程度性質之意見，而根本基於一種兼容並包之理解。此處自無須考論諸家論說之真實依據與信仰之深度，惟在此時代一抒所見者，自足以流露觀念之趨向，即足具參考價值。

調和思想表露一個基本時代認識，是對於近代變局的覺察，與提出運會說之具體理論。特以中國門戶之洞開，中西人文之交會，中外混同之日進，世界同軌一致以趨大同之未來遠景，中國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後半，多已有所見而迭加討論。變局之認識，言者甚衆。^④最早者如魏源所論，以為天地運會，自西而東，世變之乘

^③ 參看拙文「張之洞與晚清中西調和之思想」，收入「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④ 晚清之覺察近世之大變局者，言者甚夥，拙著：清季兵工業之興起，第三章及其註47，提到有李鴻章、丁日昌、瑞麟、王文韶、楊昌濬、王韜、曾紀澤、黎庶昌、王先謙、張自牧、湯震、康有為、張之洞。拙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頁192、193及215，提到有黃恩彤、黃鈞宰、恭親王、郭嵩燾、薛福成、夏燮、吳可讀、張裕釗、歐陽柄榮。

，已自然而至：

「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圜體，其自西而東乎。前代無論大一統之世，即東晉、南唐、南宋、齊、梁偏隅割據，而航琛獻寶之島，服卉衣皮之貢，史不絕書。今無一登於王會，何爲乎。紅夷東駛之舶，遇岸爭岸，遇洲據洲，立城埠，設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盡爲西洋之都會，地氣天時變，則史例亦隨世而變。」^{③⑤}

嚴復舉以爲運會之必然：

「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爲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爲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聖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觀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後天而奉天時；唯逆觀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於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於至安。後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聖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聖人之初無有事也。」^{③⑥}

皮錫瑞則自運會而說及其必變之勢：

「今五大洲通而爲一，乃古來未有之奇變。天地之氣運，一變至此，人何能與天地相抗，能迎其機而自變者，其國必昌。不能迎其機而變者，其國必亡。至於國亡之後，必別有人代爲之變。俄之彼得，日本之睦仁，能迎其機而自變者也。既有其物，而人見爲利，則必不能廢而不用。必欲遏之廢之，不肯自變，將來亦必終歸於變，此天地之氣運如是。」^{③⑦}

以云運會氣數，今人或必疑譏爲迷信之一端。當時人必自此故舊信仰基礎，發抒新論，固不免有其時代局限，未能卓然獨論世界局勢之必然。然新論之有重大意義，

^{③⑤} 魏源：海國圖志，卷5，總敘。

^{③⑥} 嚴幾道詩文鈔，卷1，第1頁。

^{③⑦} 湘報類纂，乙集，卷下，第28頁。

乃為真實，其開拓眼界思域，則尤為真實。其能就此以觀測出未來世界混同一致之大勢，則更為可貴之遠見。世界大同之理想，向為中國思想傳統，近世之萬國薈萃，學者尤多趨此調和同化之見。歐洲文明諸邦，雖亦早有，而真正覺悟，當在第一次大戰以後，尚只為少數先知先覺之意見。^③

調和中西異同之見，以中國自身立於主位，而取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禮失而求諸野之傳統觀念為根據，如此則異同之間可化除內外主客之疑慮，以達成吸收融會之目的。李鴻章即以此觀點，明言接納新事物之必然性：

「嘗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開闢之初，生民渾噩，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即不能無爭鬪。聖人者出，於是有所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為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即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數，以通我中華。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洞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尚者道為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為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

^③ 韋爾士 (Herbert George Wells) 在第一次大戰後，立志著世界史綱 (The Outline of History)，其主要宗旨，在以世界全史之認識，為人類共致大同之重要途徑。其導言發抒此種主張，至為痛切。「吾人對於全世界人類史中普通之事實宜具共通之知識，其需要在過去數年之慘變中極為顯著。交通愈便，人類間之關係，無論為善為惡，亦愈為密切。故戰爭之事，已成為普及全世之大災，盲然肆其可駭之破壞。搖籃中之嬰兒為其所炸，非交戰區及中立國之糧船為其所沈。吾人已知今日世界苟無公共之和平，即無和平可言；苟無全體之福利，即無福利可得；而除具公共之歷史觀念外，即不能致公共之和平與全體之福利。世界之各人種各民族，若不集合於此等觀念之下同力合作，而猶循其狹隘自私及互相衝突之民族習慣，則惟日趨於爭鬥之途以自召滅亡耳。此理在百餘年前已為大哲學家康德所見及，此即其世界和平論之主旨，今則路人盡知矣。吾人今日之國內政策與經濟社會觀念等皆受人種起源及社會階級之歷史關係諸謬妄觀念所敗壞。歷史為人類全體共同前進之觀念，實為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之必要條件也。」

治，修明前聖制度，勿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為一家。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既為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開，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結之。實為遠識至論。其效即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③⑨}

由禮失而求諸野之固有認識，進一步即自然發展為當時代之西學源出中國說，晚清知識分子多樂為談論，蔚為一時風氣。可舉皮錫瑞之言論以為代表：

「今之學者，有漢學，有宋學。講漢學者，有西漢今文之學，有東漢古文之學。講宋學者，有程朱之學，有陸王之學。近日又以專講中學者為舊學，兼講西學者為新學。學者黨同伐異，總以學自己是，人家不是。平心而論，漢學未嘗不講義理，宋學未嘗不講訓詁。同是師法孔子，何必入室操戈。西學出於中學，本周秦諸子之遺，莊列關尹諸書所載，是其明證。史記漢書，皆云七國之亂。疇人子弟，分散海外，大約此時中國失傳，而外國得之。今仍傳入中國。仲尼問官於郟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據聖人之言，西學苟可采用，不必過分畛域。總之，無論何項學術，皆當自求心得，不當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訪，互相印證，以折衷於一是。即學派宗旨，不可強合，儘可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妨有異同，不必爭門戶。」^{④⑩}

再進一步之考究，更轉於中西基本觀念原無不同之理解。實據宋儒理論，解釋當代。則往哲之所謂東海聖人，西海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者，正乃今日中西會同之寫照。中西基本觀念既然無有二致，則聖人之制作，彼此自多不期然而會心暗合者，如此互相因襲發明，其文物自必益臻於善境。譚嗣同即據以修正西學源出中國說：

^{③⑨} 李文忠公遺集，卷5，第12~13頁。

^{④⑩} 湘報類纂，乙集，卷下，第3頁。

又：馮煦：高齋隨筆，卷1，第8頁據史記曆書以說中法西傳之故事。云：「史記：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後此回回之於曆，歐羅巴之於算，皆原從中土流散，在彼而衍其傳者，此可為西法襲中法之一證也。」

「說者謂周衰，疇人子弟相率而西，故西人得竊中國之緒而精之，反以陵駕中國之上。此猶粗淺之論，未達夫性善之旨，與聖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同生於覆載之中，性無不同，即性無不善。彼即無中國之聖人，固不乏才士也。積千百年才士之思與力，其創制顯庸，卒能及夫中國之聖人，非性善而能然歟？又以見聖人之道，果順天之陰陽，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損於其間，強萬非以所本無而塗附之，故闔合而懸同歟？就令如說者之言，西法皆原於中國，則中國尤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復於古矣。見飛蓬而作車，見蜘蛛而結網，一草一蟲，聖人猶制器尙象，師之以利用，況窮變通久，如西法之爲聖人之道乎？不然，且曰貧曰弱，長爲人役，聖人之道乃終亡矣。故嗣同以爲變法圖治，正所以不忍盡棄聖人之道，思以衛而存之也。」^④

嚴復並言中西相通理論，但明判其各別生成實然：

「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字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Sir Isaac Newton) 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後二百年有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書造論，貫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絕作也。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彊不息爲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關事實，適用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已。祖父雖聖，何救子孫之童昏也哉。」^④

^④ 譚嗣同全集，第396頁。

^④ 嚴幾道詩文鈔，卷4，第2～3頁。

郭嵩燾在光緒二年，送別衛廉士（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回美國之詩。有云「塵中世界原同趣」。則據中西理念原本相同為言，皆中國知識分子言笑間所自然流露者。是以郭氏論中西本性，多自同發，而瞭然世勢，若在指掌。

「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利避害同，喜諛惡直同，舍逆取順同，求達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於理，强者亦可使退聽。」^{④③}

雖然諸端衆說，在解化歧異。融會中西不同觀念，出之以調和理論。然此調和理論之基礎，實本之於一項中國知識分子所持有的理性修養，理性實為自上古以來貫串中國歷代思想之一枝重要脈流。在中國思想史上，理性時時沉浮於思潮之激盪，甚或一時全被淹沒，然仍常有再放光輝之時。自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確立一理性之思想世界，歷代知識分子承此傳統遺產，多有發揮，用以清除一時代之迷惘、狂妄、放蕩、浪漫、神秘、獨斷之時髦風氣，而終獲最後勝利。晚清據理性以觀當世大局者固自不少，郭嵩燾則特別舉出此項管鑰，以為決事之基礎：

「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以情，揆之以勢，乃以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御夷狄之規模，有得有失，而理勢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制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夫之氣鬪，此道遂絕於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亦略可觀矣。閣下之言曰：一誠可使豚魚格，根本之言也。而大略出其中，豈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羣生，胥是道耳。昔賢謂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東之行，傷之久矣。君子之所謂解事者，是非得失之機。世俗之所謂解事者，禍福榮辱之末。與世俗人相處，足以消弭道心，網蔽知識，某之於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④④}

④③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12，第8～9頁。

④④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9，第11～12頁。

又：陸寶千撰：郭嵩燾之洋務思想。（載廣文月刊，一卷三期。）提出郭氏思想以循理觀念為基礎，實是確當不刊。

曾紀澤亦同樣據事理而觀測中西交通之新局面：

「中西通商互市，交際旁午，開千古未曾有之局，蓋天運使然，中國不能閉門而不納，束手而不問，亦已明矣。窮鄉僻左，蒸汽之輪楫，不經於見聞，抵掌拊髀，放言高論，人人能之。登廟廊之上，膺事會之乘，蓋有不能以空談了事者，吾黨考求事理，貴能易地而思之也。」^{④5}

國人以理性為依據，處世接物，應付時變，雖或聞見不足，而其行為舉措，大體不至失之過遠。於晚清所見，若干知識分子，雖受傳統教育，甚少習聞域外，而類能於當前局勢，提出其適應之方，其普遍覺察於變局之見解，可為顯著代表。至隨潮流而迎合於新適應者，更是不一而足，例如：吳汝綸以古文大家而首先提倡國語之統一。丁福保以文字學大家而首先提倡白話文。足以見出基本理性之所恃。誠亦可見有豐富學養，高深知識，其行為之選擇，是非之判斷，固不在於新舊，實在於其理性基礎。須知無論新舊知識分子，均必有不少糊塗蟲假冒濫芋，不管其已讀多少古書洋書，如果只是浮泛誇誕，得不到真識，徒以誤己誤人，儼然沱跡於學術圈，若蠹魚之肥且碩然。

以上所論，皆就調和思想之要質分析，總體所見，此類言論，自是以中西並觀作出發點。然俱在於調和思想本身所反應之色調。至在此範圍之外，亦並有自覺性為調和宗旨立說者，蓋即自我體認立於調和之地位。以顯著形成調和思想之外在形式。楊子玉著「息爭說」，其宗旨即在調和新舊之爭執：

「故吾願新學舊學，各順公理，化其私見，時殊勢異，學有不同，政有不同，獨扶孔教保種類之心，則無不同。心既同矣，天下事無不可同也。今欲扶孔教，保種類，則老者不必為新學也，提創可矣，少者壯者之宜為新學也，求實可矣。」^{④6}

張之洞亦自覺性的以調和新舊自居，如其所吟詠：

^{④5} 曾紀澤：曾惠敏公使西日記，卷1，第8頁。

^{④6} 湘報類纂，甲集，卷上，第42頁。

「璇宮憂國動霑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④

晚清調和思想之表達，大致考慮到中西雙方文化之優點，即使有強調本有文化優越之嫌，實質上則絕無拒斥外來文化之意。此外則若干立說之委婉，又多不免出之以許多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之理論。若一時形成之「西學源出中國說」、「運會說」、「託古改制論」、「中體西用論」。俱在此時期中代表羣體共通之概念。實足顯示同一時代中大致之理想趨向。後人或不免非笑反對，當為居於另一時代潮流之立場。甚至若干人據一嚮情願想像，施之評判，大放厥辭，直是頭腦不甚清明所致，反於後世多出許多爭論。第一，須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思想特色，任何賢者均無法超越太遠，尤其更受到個別與全局知識之所限。第二，憑事後之聰明，沒有資格非難前一代，更無權利就當代經驗多一糾正與非笑之舉。此理甚淺，早在清末梁啟超已作清楚之說明與舉例。第三，後一代人所自認為進步，高明，正確者，同樣是基於主觀假定，乘時代思潮之風氣。實質上是否真的進步，高明，正確，均頗成問題。此在思想家自己並看不出，而治思想史之學者，由其洞悉古今之通識，可以其比較而測知。

至於彼一時代何以有彼種思想，後人研究，自不應存有應該不應該之想像。即使探求考察，進而解釋，當只是多幾分澄清之程度，助人了解其現象。實亦不能保證十分完備正確，具有充分之說服力。試觀晚清調和中西之思想，每一概念均頗有其複雜之形成因素。如以「西學源出中國說」而論，謂其為表達思想之一種形式可也。謂其為近代人胡亂附會，或為積弱國勢下之自我解嘲，或為近代人思想所特有，恐均不免隔閡之推論。須知在同樣外來文化輸入，有同樣之思想表達者，這個概念之出現已是第二次，却並沒有跡象顯示牠是模仿第一次者。第一次是東漢佛學輸入中國時，影響最廣遠之老子化胡說與「化胡經」，其基本意旨，在證明世尊原即老子化身，佛學原為中國所創。（後來化胡經又被佛徒竄改，面目已非。自此，佛道二家各造假說，爭持先後，達數百年之久。）此思想之原旨，功能，故事之演繹

^④ 張文襄公全集，詩集，卷四，第8頁。

，殆與「西學源出中國說」完全同一格調。如此則有一點結論必須承認，就是：這正反應思想傳播之文化心理。恐怕必須列入人類思想傳播之一種必有之途徑，在中國史上特別具備完整之證明。如此觀察探討，則會達成人類文化傳播最基本之理論與解釋。尚不止是歷史或思想史之成就。一個有力的持續之主證，那就是接着而來的：「中國民族西來說」，與「中國文化西源說」。這種觀念，在實質上和「西學源出中國說」，是同血脈兄弟。只是戴着反方向的面具而已。要作真實了解，自然更需要從文化心理方面着手。如果只從表面性質的相衝突相對之觀點討論，恐怕只會流於思想進步或落伍之浮泛的分判，而無法了解問題根源。須知高唱全盤西化並不能證明其思想進步，却非常容易被人發覺只是一個狂熱的宗教口號，甚至於說是一個新式的虛妄之迷信。因為它的文化心理之價值方向，和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教所謂：「信了就得救」，是建立在完全相同的假想基礎之上。^{④⑧}

五、結 論

晚清政治思潮，以論發展源流，本各有其分歧，甚至保守與進取二者之態勢，又未嘗不是對立與衝突者。然則諸種動向合併而觀，尚有一更強大之潛在動向，帶使各時期各階段之思想仍循一總體方向歸趨，此即最强烈的西化之動向。此蓋與今日世界思潮合流之總趨勢，舉世動止，息息相關，西方文明，已兩三世紀居於領導全球之地位，世界各民族文化，隱顯之間，多受其影響。中國無論保守或激進，主動或被動，感染西化，已為不可避免。正如皮錫瑞所謂：「使孔孟程朱生此時，不能舍西學不講。」^{④⑨}即令純以維護古來道統而論，亦終不能免其西化。如組織孔教會者，其所為教會，乃受西方觀念啓示。所為組織結構，並亦採基督教之規制。所倡孔子紀年，實仿耶穌紀年。發行報刊，出版書畫，以為宣揚道統，實則亦盡循西

^{④⑧} 自清末以來之全盤西化論，有其時代之代表性，自然有研究之價值。但須就其廣義着眼。此處所學，只就此表面之口辭四字而言，因其既無理論架構，亦無實際思想路線，僅以高呼口號標榜進步而已。文中所提在指此類。

^{④⑨} 湘報類纂，丙集，上卷，第9頁，答問。

洋方法。若其他標明宗旨之「聖學會」、「國學保存會」、「古學保存會」等，當謂其純為維護傳統，均無可疑。而此類學會組織，一切活動，又無不取借西方，並深相效法。蓋西化為總體之動向，有浸澈之魔力。諸般觀念，均承此潛流向前發展，或並無意中建立於此基礎之上。

在另一方面看，即使同時代思想，一直存在中西觀念之歧異與衝突，發展方向頗不一致。而在醞釀新思潮之過程，又均構成吸收融會之素材，各被滅裂而再造，遂可因混熔而新生另具特色之思想。大抵古今思潮嬗變，奔流無止，而各時代各階段亦均具有其自有之時代特徵。此種總體之動向，實因思想發展必然而有，此古今中外所歷驗不移之現象也。^⑤

再前進一層探索，近代思潮總體西化之動向，就中國知識分子基本立場而觀，其本質亦並非為西化而西化，而不自覺之西化，在觀念上自然更遠一層。然則何者力量使此潮流洶湧澎湃？推考近代思潮之原始動力，則自一八四〇年以來，各時代思想特徵雖十分不同，流派紛立，各據理說，個別概念之瑣屑，復不可勝計。而最基本之原始動力則是完全一致。此即百餘年來貫串中國全部思潮中心之求富求強思想。近代中國朝野，富強之想望，實為思想發展之核心觀念。所有各時期展放五光十色之言論學說，門戶分明，其中心理念，最終願望，無不在以致中國之富強為目標。中國近代思想，萬途同歸，其原始基礎，實以富強為中心主流。然此富強觀念之發生，則西方文明之刺激；列強侵逼之壓力，又為此種啓念之動因。近代中國，患貧而又憂弱，知識分子所醒覺，與所最關心熱望，夢寐以求之遠大目標，即在要達成國家富強人民康樂之理想境界。所有思想理念之醞釀，政治社會之創制，喚醒民衆之言論，奔走呼號之行動，在在無非為此最基本之富強目標所吸引。是以百餘年來中國思想之發展嬗變，自以謀求富強為原始動力，並為支配此時代所有觀念潛流之核心。

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寫於南港

^⑤ 近人賀昌羣論思想演化之大勢，頗為鞭辟近裏，足資參考。見其「魏晉清談思想初論」，第1頁，有謂「每一時代皆有其時代之特性，當其特性在發展之時，往往與其前一代之傳統勢力，發生參差之反應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繼其傳統之一部分，同時革棄其傳統之另一部分，復摻入其他新興之部分，此歷史演變之恒律也。」